

# 生命的长度与宽度



□智效民

前不久参加某杂志社举办的新春联谊会，意外地收到周有光先生的两份礼物：一个是制作精美的瓷碗，上面有“长寿”二字和他的亲笔签名；另一个是他的新书，《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如果说长寿碗寄托了老人的美好祝愿，那么这本新书则让我看到他的长寿秘诀。

早在2008年迁居北京以后，好友就带我拜访过103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当时我们乘地铁五号线从王府井附近

的东西站上来，转了好几个弯，才到达后拐棒胡同周老的住处。这是一座老旧的居民楼，进去一看，房屋之狭小、陈设之简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寒暄之后，我看到老人笑容可掬、红光满面，说话时手里拿着一块白手帕，不时地掩口大笑。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所以我认为，乐观开朗是老人长寿的第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我发现在不足十平米的客厅里，只有一只破旧的沙发和一张小书桌，书桌上放着一台英文打字机似的东西。老人告诉我们：这台中英文打字机，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送给他的。这机器虽然比286电脑还要老旧，但是因为处理中文和英文都特别方便，所以他一直使用这台机器写作。令人惊讶的是，三十年来老人就是用这台机器写了数不清的文章，出了几十本著作。这个事实，堪称文化奇迹。

读罢《岁岁年年有光》，我才知道自从爱妻张允和去世以后，周老就把有价值的家当都给了孙女。为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比她大四岁，她去世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但是我想不到自己能活到现在。所以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由此可见，豁达通透的人生参悟，是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

张允和先生是2002年逝世的。在此之前，因为她出了好几本书，各路媒体对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为此她对丈夫开玩笑地说：“我比你还有光。”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她喜欢穿中式大襟上衣，再用花色的线绳与花白的头发编成一条大辫盘在头上，浑身透露出一种典雅大方的“民国范儿”。据说张先生在世时，二人在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要喝杯咖啡或红茶，并且举起杯相互致意，用周老的话来说，这叫“举杯齐眉”。所以我认为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长寿的第三个原因。

说到这段姻缘，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二人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按照旧的风俗，这一天叫“尽头日”，特别不吉利。为此，周家保姆偷偷地拿上他们的生辰八字找人算命，没想到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啊，都活不过35岁。”但是，周有光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旧的尽头正是新的开始，结果妻子活了93岁，他已经度过111岁的生日。这是不是说明相信科学、绝不迷信，是周老长寿的第四个原因呢？

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的：长度是指人的寿数，宽度是指生活质量及其贡献。年过百岁的周有光虽然身居陋室，却仍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断地表达了忧国忧民的赤子心怀。这就把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发挥到极致。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 名家言

# 等待是一种文化

□张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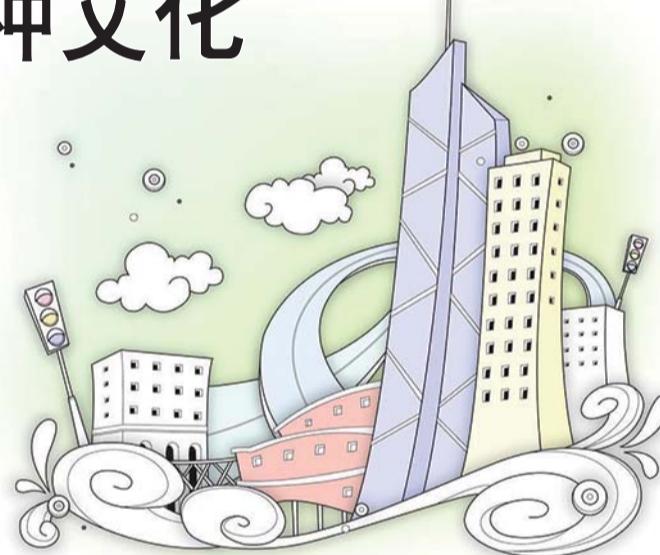
要不是女儿自作主张为我和妻子办妥了跟团去美国旅游的一切手续，我这辈子大概很难下决心平均一个人花两三万块钱去美国作十多天的走马观花游的。那基本上就是，乘车，屁颠屁颠两三个小时，下车，上洗手间；然后屁颠屁颠两三个小时，拍照；再屁颠屁颠两三个小时，吃饭；接着再上车，屁颠屁颠……如果说有一种扛着背囊的旅游者叫背包族，那么我们这群整天坐车里的游客就只能叫“屁颠族”了。我们从纽约到华盛顿，再到布法罗，然后从芝加哥到盐湖城，再到黄石公园，接着到拉斯韦加斯，最后到洛杉矶，一路日夜兼程，风尘仆仆，终于一屁股将美国从东到西贯穿了一遍。要不是还保存着旅行社的那张旅程表，脑子里已经一桶浆糊，都搞不清照片上的背景是哪儿哪儿了。

然而，还是值得。

无论是沸反盈天、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降的尼亚拉加大瀑布，还是被硫磺泉熏染成图案斑斓的黄石公园大楼镜湖；无论爬满青藤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拉斯韦加斯赌城；天上地下，人文娱乐，都称得极品，开了眼界。

其次是一些中途停留或过夜的城市，比如水牛城、费城、盐湖城，还有那个杰克森小镇。曾经耳闻，如今目睹，百闻不如一见，惊艳了，没想到城市原来是可以这样美的。尽管那些建筑风格迥异，透着浓郁的文艺复兴或中世纪时期的古典情怀，但她们谈不上豪华，也并不摩登，没有值得炫耀的高楼，也未见有亭台楼阁、回廊水榭的风雅点缀；尤其一些住宅小区，除了一栋栋普普通通的住宅，剩下的也许就只有蓝天白云、洁净的街道与绿色的草坪了。然而，它们已足以令我欣喜、沉醉其间。别墅的结构大多简洁而拙朴，倒是家家户户的门头、窗棂、壁挂，都有点花俏，却是个性十足，雕蝙蝠的、挂牛头的、垂鹿角的，更多的人家廊前悬吊着成对的花篮，花团锦簇，摇曳多姿；还常见街角、路边，或树丛间矗立的塑像：一头憨厚的黑熊、一尊身披青藤的雄鹿，或是一只画着印第安人彩绘的水牛……无不传递着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信息。据说，还真常有麋鹿和水牛出没，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不带走一声呵斥。

这样的日子，不说有多么精致，优雅却是肯定的。慢条斯理，不急不躁，把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



其实，这样的优雅随处可见。有人称“优雅是不会褪色的美”，因为它原本就不是漂浮水面的油花，而是融化在一个人的血液里。

作为“屁颠族”，这回看得最多的自然就是车窗外的风景了。除了一望无际的不见土壤裸露的草坪，还有无数奔跑在高速路上的车，无论大车小车，载人还是运货，一个个中规中矩，各行其道；看不到有人抢道超行，更听不到身后催促的喇叭；每到丁字路口，不管有车没车，有人没人，必先停车，留够时间，然后启动。即便交会的对方比自己晚到，也尽量礼让。如此优雅，从容不迫，常叫我心里嘀咕：他们难道就没有“时间紧，任务重”这一说吗？如果他们来我们中国开车，不是很惨吗？寸步难行了。

优雅的人，好像天生就是慢性子。平时无论行走还是乘电梯，或是到餐厅入座，但凡遇到可以“先下手为强”的机会，他们必定选择放弃，说声“请”，而绝不会“机不可失，捷足先登”。

由此我相信，国人出国，一般不会吃亏，总能领先一步，占得先机。

不过，这回游美的十几天行程中，还真没见国人与西人遭遇时有过什么“抢占先机”的举止；相反，国人都很节制，还经常伸出手示意对方“先请”，并说一声“Please”。

附带说一句，我本来最担心的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似乎也都戒了，至少在我这一路上未曾看见，最多只是在集体上厕所时听到不少人抓紧时间清理喉管。为此我如释重负，并深感欣慰。我甚至想，与国际接轨原来也不是件太难

的事，大不了把国人都轮训似的组织一趟“接轨之旅”，哪怕只是“屁颠游”，也划得来，毕竟可以重塑一个人，粗鲁变优雅，我们的社会自然就风清弊绝了。

当我在为自己的这个设想沾沾自喜的时候，却传来中国游客在洛杉矶为抢座位大打出手的新闻，连警察也出动了。一位华人导游悲怆地告诉我们，在一些需要乘坐巴士的景区，比如科罗拉多大峡谷，中国游客多，抢座位的事屡见不鲜。

很快我也发现，只要国人在一起，看到对方也是黄皮肤，大家便省却了很多“繁文缛节”，一个个故态复萌，什么“请”、“Please”，统统派不上用场了，底线大概就是尽量不惊动美国警察。就曾在一家自助餐馆，见一对青年情侣，占好位子，然后就猴急地抢拿热门菜，终于吃撑了，结果走的时候竟留下许多原封不动的鱼、虾、牛排和整整一盘西瓜，看得我想骂娘。

原以为到达文明的彼岸不是太难的一件事，不就是学会忍一忍吗？忍就意味着等待，等待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何乐而不忍？

然而事实证明强忍不等于等待，能忍一时的人，不等于就是乐于等待的人。等待是一种文化，骨子里浸润着优雅与高贵；而强忍的人，动不动就会面目全非、原形毕露。

书法家林散之说“字有百病，唯俗难医”，人也一样，最难治愈的也就是一个字：“俗”。

(转自《文汇报》，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 碎碎念

# 拆墙与城市文明

□陈伟

国家出台新政策，提倡要建开放小区。不得不说，这是一大惠民良政。这一政策，背后是一种开放精神。拆墙的时代来临了！

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个人承包一块，自己顾自己，古代儿童启蒙读物都宣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近代革命志士仁人多慨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就是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山头主义，小集团主义，缺乏对全局的关怀、对国家的关心，民不知有国，一盘散沙。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仍然渗透到21世纪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前全能主义社会中的“单位制”，不过是一个现代科技包装起来的小农空间，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功能齐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这种单位为基础，全国形成类似蜂窝的结构，结果是大型的合作秩序发展不起来，各种资源与信息不能很好地流通，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也极其低下。一个大学，一个工厂，一个机关，都靠围墙圈出一块地，在那里经营。

例如，围墙中的大学，早就引起国内教育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批评。然而，各个大学的围墙还是一道道建得固若金汤，就差跟紫禁城的红墙相媲美了。北京大学的西面和北面的围墙，是由巨石垒成的，估计铁炮来了也只能轰一个豁口。北大进门要登记，繁琐不堪，外校人员蹭课蹭饭，皆不可能；慕名想入北大朝圣而没有带证件的人，到了北大门口，躲躲闪闪，形如做贼。北大东门更有一些“黄牛”——多为北大校内家属，忽悠外地游客，做起带客入校的黑生意，一次五十一百，赚钱轻松愉快。本人作为校友，幸有一张校友卡，可以自由出入。尽管如此，有一次还是十分晦气，一个保安硬说我的卡是假的，我说我是去里面参加学生论文答辩，是人大老师、北大校友，他说：我不信。真是气死人了！

一个政策制定，需要有依据。看看过去几十年北大一直有校外人蹭课蹭饭蹭教室，但北大就大乱了吗？教学秩序就被破坏了吗？非也。我们看很多名人回忆，常提到游走在北大里面蹭课，获得灵感和启迪，这不也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吗？至于禁止旅游团参观，只需立个警示牌子就可以了，何必搞个实名登记？实际上，旅游团登记后，还是可以进校参观。真不知道北大是如何论证这个“公共政策”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围墙的“门虽设而常锁”，从东面进去，要往北绕到北大校医院，经过两道栅栏，每道皆有保安，然后才能靠近政府管理学院大楼。真不知北大凭这样落后、原始的理念，如何做好“政府管理”？

如今，顺着“开放社区”良政的东风，我想北大的大门是否应该变得开放些了呢？当然，那些围墙能推倒，估计还要等三百年。

围墙虽然用料不多，但对空间的区别，对交流的阻碍，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它加剧了每个人各守一摊的意识。所谓的安全功能，其实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没有翻墙的本领，还去做小偷？我近年居住的双榆树小区，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得越来越封闭。不仅小区用高高的铁栅栏围起来，各个楼之间也围了起来，大门还要上锁，所以租户搬个家，搬家公司的车就进不去，只有老牌房东才拥有那个围墙大门的钥匙。从前年开始，我们的楼装了门禁，一个二十多年的老楼，突然赶时髦来了，难道现在的贼比过去更多了吗？如果是这样，国家宣传的文明进步体现在哪里呢？

从去年开始，楼下的街道两边也立起了白色铁栏杆，而且都是很高、人跨不过去的那种，到街道对面去，都要绕到某个口子处。市民不满意这种围栏，私自拆了好几个便于出行的口子。估计负责建围栏的官员又借机大捞了一笔。可叹无数市民在这些栏杆规定的路线中买菜出行，如同养殖场为了防止动物乱跑而给动物设定的狭窄通道一样。

如今，国家有了这样的政策，实在是如中学课本所言，“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件惠民的大好事。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城市的自由，正在于各种方便。然而，以传统国人心态，城市不过是一个现代的村落，不是吗？有的小区干脆就叫“某某新村”；“人在城市，心是农人”，如韦伯所言，城市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异乡”。在21世纪，这种状况是该改变了！围墙文化，也该画个句号了。童年的歌谣《让我们荡起双桨》中，“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这样的图景一去不复返！公园要开放，歌词以后得改为“四面环绕着绿树红花”。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